

论民生与教化并行的共识凝聚逻辑

苏志宏

内容提要 自孟子的“制民之产”论开始,民生与教化并行的共识凝聚逻辑一直主导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本文在阐释了这一逻辑在传统社会中的发展脉络和基本内涵之后强调指出,如何在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中完成这一逻辑的现代转型,是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

关键词 民生与教化 凝聚共识 制民之产

苏志宏,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610031

传统大一统政权为达成核心价值层面上的民众认同,实现长治久安,始终遵循民生与教化并行的共识凝聚逻辑。养民与教化相辅相成,关怀民生与道德教育并行互动,始终是历代政权与人民之间的互信得以建立、共识得以达成的基础。回顾历史,发掘和整理民族传统文化中那些有关意识形态结构和认同方式的资源,梳理这些资源的特征和倾向,分析这些特征和倾向对于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起着怎样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对于我们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之向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已经将民生（“制民之产”）作为教化（“驱之向善”）的前提条件。所谓“制民之产”主要是指：“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春秋战国之际，王霸之道杂陈，列国争相发展生产、壮大国力，以求一逞。《孟子正义》曰：“盖凡古法变异之初，未尝不托于权时制宜之说，是故齐作内政，晋作辕田，鲁作丘甲，用田赋，郑作丘赋，固皆以为制民之产也。李悝之尽地力，商鞅之开阡陌，莫不以为制民之产也。而适使民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为其本不从民起见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2XKS007)、西南交通大学“文科发展战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资助项目、西南交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重点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公共行政的科学精神

王 锋

内容提要 当公共行政在祛除价值负担后,开始了技术化、科学化的追求,并沿着专业主义、技术主义与管理主义进一步发展。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也面临过“合法性危机”,但其中的科学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这种科学精神内在的包含理性精神、客观精神与专业精神。当代中国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行政管理没有经历过理性化的自然演进,在实践中还存在着对科学精神的偏离与误解,这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公共行政科学精神的实质,重视培育公共行政的理性精神。

关键词 服务型政府 公共行政 科学精神

王 锋,南京大学服务型政府研究所博士后 210024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221116

与工业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相适应,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从其产生之始就开启了其理性化的进程。当公共行政在祛除价值负担,成为纯粹的事务性领域之后,就开始了技术化、科学化的追求,并沿着专业主义、技术主义与管理主义进一步发展,在公共行政的理性化过程中孕育出相应的科学精神。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也面临过“合法性危机”,但其中的科学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服务型政府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行政类型,作为对管理行政的否定,使得公共行政的二重性特质在后工业社会条件下得到充分展现,这就是公共行政的技术性与价值性的两面在服务行政的背景下得到完全呈现。在当代中国社会,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历史性的跨越,它没有经历西方社会的自然演进,行政管理体系也没有经历西方社会的理性化熏陶,换句话说,行政管理体系的理性化、规则化、法治化还远未完成,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中国服务型政府要完成多重跨越,就必须正视公共行政演进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科学精神,即理性精神、专业精神与客观精神。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研究》(11&ZD070)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行政精神研究》(13BZZ06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逃出平等的“阴影”

——身份焦虑的现代性解析

薛 洁

内容提要 近代工业革命和宗教改革的出现,撼动了世俗的封建等级与教会的教阶制度,改变了身份由血统决定的事实,让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恰恰在社会打破等级进入现代平等制之后,社会却出现了人们内心普遍的关于身份的焦虑。究其原因,首先是现代平等社会成功标准由获得救赎变为了彰显蒙召;其次是人们在等级制度下与工业体制之下获取财富的方式、目标以及财富观发生了改变;最后还因为进入平等社会人们的比较对象发生了转变。现代国家可以通过增加社会的公平福利、改变成功的单一标准来减少平等观念带来的焦虑“阴影”。

关键词 平等观念 身份焦虑 中世纪 宗教改革

薛 洁,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暨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130012

人类焦虑的独特性来源于这一事实,即人是一种会进行评价的动物,是一种会根据象征和意义来解释他的生活与世界,并将这些与他作为一个自我存在等同起来的存在。

——罗洛·梅

人类摆脱等级社会,进入现代文明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以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为标志的近代工业文明,推崇平等、民主、自由的现代政治理念,也为每一个人创造了摆脱身份的束缚、从事与祖辈不同职业,享受成功带来的富裕生活的机会。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成功或不成功的人,开始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未能获得更高的社会身份不再心安理得,而是经受着其祖辈未及体验的心理焦虑。“历史证明,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1]。在现代政治制度消除了等级对待、实现了“人生而平等”的理想之后,如何才能正视并消解人们所面临的心理焦虑,获得人类心灵的巨大安宁?显然,这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问题。

本文系 2011 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合作正义与公民义务感的养成”、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11JZD030)阶段性成果。

[1][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年版,中文版序言。